

# 改革开放的几个侧面

本报记者 史冬柏

**提示** 在历史长河中,4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岁月。大时代的宏大叙事背后,有每个人的见证和参与,交织着无数个个体命运的巨变。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是人;最该书写的,还是人。作家李舫这样解释由其主编的新书《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书名——“我们今天所见者,就是历史智慧,我们所证者,就是中国道路。”透过这本书,也许我们不仅能够重温改革开放的一次次彷徨与前进、探索与成功,更可以捕捉到新中国成立70年时代变迁的精神气息,窥见民族复兴的历史足迹。

## 思想观念突破开启新历程

5000、500、170、100、70、40。对中国人来说,这一串数字意义不凡,分别对应着:中华文明50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500年、近代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这些数字的起笔,基本都绕不开“思想”。祖先崇拜的信仰,以理性化的思想形式延续下来,使中华民族塑造出独具样貌的文明形态;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诞生;救国思潮轮番实践,拉开近代史的帷幕;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得以酝酿创建……

作家托尔斯泰说:“思想,就是推动自己和全人类的生活的力量。”

这力量究竟有多大?且看,一篇文章就拉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从此,改革开放大潮在中国大地不断涌起。”

这篇文章就是家喻户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主要作者是胡福明。

思想开启并引领时代。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40年40人,分别编入思想篇、创业篇、突破篇、国际篇,但还得从思想者的故事讲起。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写文章有多难?胡福明的创作过程足以令那些连博士论文都“速成”的人汗颜:真正出思想,怎么可能轻轻松松——

1977年的三四月间,正是胡福明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他开始酝酿写文章了;9月初,胡福明在南京大学邮局门口,将8000字左右,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收到回信及文章小样,对文章做进一步修改;4月,胡福明到北京,与《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以及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等人共同讨论修改;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于当天全文转发。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掷地有声,迅速引发连锁反应。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章的影响力从思想层面走进现实,一场巨变如雨后春笋钻出地面。

## 在历史潮流助推下成就自我

“不是我选择了改革,是改革选择了我。”作家蒋子龙的经历,让我们领略到改革开放的伟力:这场大潮,不仅是无数弄潮儿掀起的,而且成全或造就了一个个“浪里白条”。

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1978年,蒋子龙还在重型机械行业的一个工厂里任锻压车间主任,结合自己的苦恼和理想,思考着“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就这样,一部描写某电机厂内部改革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与阻力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水到渠成。用蒋子龙自己的话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过程非常简单,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了乔厂长,而是乔厂长找到了我。”以至于他只花了三天时间,就写出了这篇名垂之作。

蒋子龙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坦言:“赶上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期,现实催赶着不多看不行,不多想不行,灵魂得一次又一次地蜕变。就像蛇一样,不蜕皮长不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当代文学乃至每个人的生活都跟这场改革绑在了一起,波澜起伏,丰富而充实。”

被大潮推着走,有多重身份的蒋子龙体会颇深。从体操王子到健力宝总经理助理,李宁运动品牌创始人,再到上市公司总裁,身家过亿人的商界精英,在改革开放浪潮的一波又一波助推下,李宁一次次实现着人生的跨越。

当初,李宁选择进体操队,并非出于多么强烈的兴趣,而是因为一个很单纯朴实的想法,就是为了吃饱饭。在他入选国家队的前一年,中国刚刚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中国选手开始走上国际竞技体育大舞台。“他

职业生涯最辉煌的那些年恰好赶上中国体操的黄金年代,当年,国人对体操的关注度远远超过篮球和足球。”于是,提振其民族自尊心的李宁被当成民族英雄,受到全民追捧。

1988年,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年。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摸索中,面对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吸引和挑战,退役的蒋子龙毅然放弃地方体委的任职邀请,只身来到广东闯天涯,从此走上从商之路。中国加入WTO,一波波互联网浪潮,让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成为一次新机遇,蒋子龙用他在赛场上那股拼搏的激情,带领他的公司愈挫愈勇,走向明天。

大潮涌起,只有抓住历史契机,勇于奋斗,决不放弃,才能踏浪而歌,不被拍在沙滩上。

## 时代变迁背后是不变的初心

有人说,写字即写人,写人即写心。心里装着精神。可是,丹青难写是精神。

改革开放是一部史诗,也许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记录经济奇迹的那些段落。其实,合上这部史诗,怎能不由得感慨:这也是一部心灵史,精神史。贯穿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隐藏在中国特色道路背后的,是不变的初心,是心与心的贴近和包容。

今天到过汕头的人,几乎很难想象得到,40年前的这座城市,环境卫生脏乱不堪,马路污水横流,街道两旁到处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华丽蝶变,须得追根溯源。1979年3月3日,时任广东省主要领导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

引到这块地方来……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了!”

“要杀头,就杀我”,正应了邓小平那句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也不是请客吃饭,“杀头”与“血路”,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刺耳,但反映的却是一颗赤子之心——何以不惧“杀头”,凭什么敢闯“血路”?皆因为心中只装着百姓。这初心纯正,心底无私,改革或创业就有了无畏的勇气。

“我们这一辈人提着脑袋闹革命、办特区,为的就是理想,哪里想过当什么官?”昔如埋剑常思出,今作闲云不计程。’我是90多岁的老人了,能尽的力量已十分有限。希望青年人不忘历史、坚守信仰。”晚年的吴南生这样回答年轻人的提问。

国际友人的初心同样与我们心心相印。“中国通”费正清心系中国,愿意“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来救赎美国”,一生中五次来到中国,主编了著名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这折射出开放的气象,也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交融。

一首现代诗歌写得真好,“从中国走来的中国/焕然一新是你70年的气质/从改革开放走来的中国/40年是你古老的生命/最新一枚时间勋章/短短70年/走过了人类史漫漫数百年的路程……这,就是/中国道路/也是时间/无与伦比/中国速度/辉煌的/70年中国时间”。

40年,远远不止40人。40人是亿万人的代表,正如改革开放40年是新中国70年的一段缩影。向有标志意义的人物致敬,根本上说,就是向风雨兼程中各行各业的奋斗者致敬,向追求美好、心怀友好的每一个逐梦人致敬。

## 古书标点谈何易

戴建华

古书无标点,断句需要口耳相传。听者或作标志,古人称为“句读”:停顿短处用“。”,为“读”;停顿处长用“。”,为“句”。此于现代人甚为不便,于是标点古书就势在必行。然而,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即使是博雅大方之家,也不免出错。所以古人有“学识如何观点书”的感慨。

我们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过去的几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标志性的事件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出版了标点版《资治通鉴》和点校本《二十四史》。现在,点校本《二十四史》正在陆续出版修订本,整体上确有长足的进步,但在标点上还是有不少问题。这正如古人所

说,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是未必扫之能尽的。

以修订本《南齐书·张瓌传》为例加以说明。张瓌字祖逸,从刘宋到萧齐,做了一大堆的官。(一)“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参军,署外兵,随府转为太傅五官,为义恭所遇。”原版作“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参军,署外兵……”“解褐”谓脱去布衣,担任官职。“行”谓兼摄官职,“署”谓代理官职。正确的断句应是“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参军,署外兵……”修订本越错越远了。

(二)“迁太子舍人,中书郎,驛骑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原版同。“迁”是晋升或调动。“太子舍人,中书郎,驛骑

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都是官名,中间应用顿号,而不是逗号。

(三)“转通直散骑常侍,驛骑将军。”原版同。“转”是转任,逗号应改为顿号。类似于“明年,转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及“建武元年,转给事中,光禄大夫”。这两句相隔数行而已,都不错,如果加以比勘,前后对照,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四)“迁侍中,加领步兵校尉。二年,迁都观尚书,领校尉如故。”

(五)“迁为左民尚书,领右军将军……”“领”谓以地位较高的官员兼理较低的职务。所以“加领步兵校尉”“领右军将军”的前面应是逗号,而不是顿

号。说也有趣,“领校尉如故”就是指前面的“加领步兵校尉”,“领”字前面却是逗号,当然是正确的,为什么前后不一致呢?是不是该用逗号还是顿号,还拿不定主意呢?

而且,这两处原版都不错,修订本却改错了。总之,仅从标点看,固有原版错,而修订本改对了;但也有原版是错的,修订本也没有看出来,从而没有改正的;还有原版是错的,修订本也是错的;更有原版是对的,修订本反而改错的。

古书标点不是容易的事。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任重道远,但应该后出转精,所以希望精益求精。

## 杜甫的众筹生活

张永涛

**提示** 《杜诗镜铨》卷七有相连成组的九首诗,是杜甫初到成都营建草堂的实录。为建草堂,杜甫发起众筹,朋友纷纷认筹,有人出钱,有人出物,甚至后来草堂受损修缮时,还是依靠众筹。但靠众筹过活不容易,历历载籍,多少众筹发起人如姜夔、如《红楼梦》里的詹光(沾光)、单聘仁(善骗人)、卜固修(不顾羞)都被人们讥议为“打秋风”的清客,何以杜甫能对此免疫呢?

《杜诗镜铨》卷七有相连成组的九首诗,是杜甫初到成都营建草堂的实录。组诗诗题《卜居》《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椀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子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诣徐卿觅果栽》《堂成》。除首尾两诗分咏选址、竣工外,其余七首都是向成都附近的友人寻求资助的。有人出钱,王司马“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有人出物,向萧索要桃树,“奉乞桃栽一百根”;向韦班要松树、要瓷碗,

“为觅椀根数寸栽”“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向徐卿要果树,“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这帮朋友都很给力,草堂建成,周围椀木成林,竹篔簹露,有《堂成》一诗为证:“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椀林碍日吟风叶,篔簹和烟滴露梢。”一句话,杜甫草堂,是众筹的。

这众筹的草堂还有后续的故事。草堂六位认筹人王司马、萧实、韦续、何邕、韦班、徐卿,前五位官职姓名判然,最后一位徐卿却仅是模糊的敬称。明末清初的学者朱鹤龄疑此徐卿是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为后来浦起龙《读杜心解》、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所遵从。草堂建成两年后,就是这位徐知道在成都举兵叛乱,杜甫一家避走梓州。叛乱虽很快被救平,但因种种原因,杜甫两年后方始重回成都。或许杜甫不想在自己的诗中表现出曾与朝廷叛臣有瓜葛,所以故意在诗题中做了模糊处理。

经历一场兵燹,又长期无人打理,草堂只怕日渐颓损荒芜。半生流离的杜甫,对这座给自己带来一段美好时光的草堂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外避乱期间不断念叨着他的椀林竹林松树桃树:“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舍弟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寄题江外草堂》)、“高秋总忆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等终于

回到成都时,草堂果然是“开门野鼠走,散棘壁鱼干”(《归来》)、“避贼今始归,春草满空堂”(《四松》)。面对此情此景,杜甫又兴起他那标志性的感叹:“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草堂》)

草堂显然需要重修,只好又是一场众筹。这次杜甫没再写哪些朋友帮了忙,而是对着一位许诺认筹,但资金未到位的朋友开了一通玩笑:“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资。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王录事许修草堂资不到聊小诗》)似真似假,一派烂漫,化借钱之窘为天真自然,也只有杜甫做得到了。

其实不仅营建修缮草堂,杜甫一生基本都在寻求和接受着他人的帮助和救济。年轻时写过很多干谒诗,希望在仕途上得到汲引,但基本没什么效果。等到辞官一路“漂泊西南天地间”时,在生活上寻求接济的诗就多了起来,居蜀期间,严武、高适、岑参都对他有过帮助。离开成都后,杜甫仍在夔州定居三年,主要也是靠当地都督柏茂琳赠送的40亩橘园提供生活来源。

靠众筹过活不容易,一个拿捏不好,就成了打秋风的清客相公。姜夔布衣终身,游走于清贵之门。姜夔自述,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朱熹、辛弃疾、楼钥、叶适等人都曾对其施以援手。《暗香》《疏影》两阙咏梅词就是在曾

做过参知政事的范成大府上写的,词前小序云:“辛亥之冬,余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投宿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肄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词写得确实好,但在他人家中长住,利用自身特长提升主人生活品质,多少总会贻人口实。

姜夔的字是尧章,这一名一字也易启人遐思,夔是尧舜时代的乐官,尧章当是“尧时乐章”的意思,终其一生,他竟真的以音乐和文学才能换取衣食。姜夔说自己“万里青山无处隐,可怜投老客长安”,他的词可纪年的不过70余首,竟写于20多个地方,这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固定居所,一直转徙于资助者之门。王国维对姜夔的评价极其苛刻,如“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白石有格而无情”,唯一的褒扬乃是姜夔对自己合肥恋情的真情流露——“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细品王国维之评语,他认为姜夔格调虽高却乏真情,技术虽高但格局小,境界低,不脱清客本色,甚而更进一步讥议其为人:“白石与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连姜夔这样的高手都要面对

严厉指责,更何况他人呢?或许正因年轻富贵时见惯了那些有姜夔之行,又无姜夔之能的人,曹雪芹才会故意为贾府清客起名詹光、单聘仁、卜固修,不动声色地讽刺了这类人物的三大软肋:沾光、善骗人、不顾羞。

同样是众筹,为何有人被认为在情在理,有人就成了打秋风呢?端在格局不同。把众筹作为谋生的手段,格局就小了,清客们想着“独善其身”,攀龙附凤,追名逐利,用钱理群的话说,这是一群过着寄生生活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杜甫,抽于谋身,却敏于谋众,不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他自己的茅屋破了,却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自己的儿子饿死了,却想着“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徙,因念远戌卒。忧端齐终南,涸源不可掇。”这简直是把自己奉上了理想的祭坛。

杜甫,在谋生问题上不敏感不积极,但他把自己的生活与人类和历史连在了一起,所以为生活众筹时能做到毫无机心。正如《列子·黄帝篇》的海上之人,在他不存机心时,每天早上海鸥都与他嬉游,但当他听从父亲的话,想抓一只海鸥时,就没有一只肯落在他身边了。众筹时,清客是有机心的,杜甫是无机心的。因着这无机心,募筹者心安,认筹者理得。

## 书单

### 一念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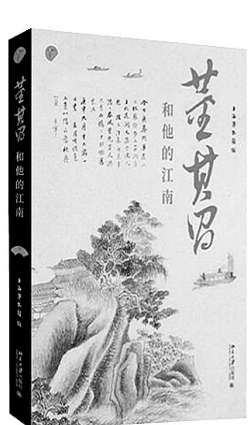
时间流逝比你以为的更快,所以你拼命奔跑,难免跌倒。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可是,你不能躺着的时候,放下手机,看本书?

本周书单的主打推荐是《董其昌和他的江南》,让我们再次领略文人画的韵味。其味在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精神,儒家“温良恭俭让”,其主流及最高境界是“化阳刚为阴柔”,含蓄之中又复归于一种平和的自然状态。明代杰出的书画家董其昌集前人之大成,融会贯通,洞察画坛时弊,明智地提出画分“南北宗”的审美观,并以创作实践充分印证其理论所达到的文化高度,足以与“元四家”及唐宋各大家相媲美,无争议地被载入中国杰出文人画家的史册,同时也是文人画理论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尤其是董其昌“笔墨论”的提出,翻开了文人画史的新篇章,清四高僧、四王吴惺、金陵画派、新安画派,乃至晚清画坛,大多在其理论影响下,形成了一个群体性的文人画创作高潮。

在《我的瓦格纳人生》一书中,蒂勒曼从职业指挥家的角度,带领读者全景式领略瓦格纳的世界:瓦格纳的个人奋斗史,与德国意识形态的溯源及后果,拜罗伊特音乐王国的建立与维护,各代瓦格纳家族、乐队、指挥、导演及演员的风格与成就,每部瓦格纳歌剧的特点和地位,各个时期瓦格纳歌剧录音版本的优劣,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与在其他歌剧院指挥瓦格纳作品的不同……对于“我们的时代为何需要瓦格纳,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瓦格纳”这一关键问题,蒂勒曼在破除种种禁忌、神话和误读之后,以真实、朴素的笔调,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此外,从余光中的《一念永恒》里,你还可以感受到他与时间对抗的倔强,以及从容生活的豁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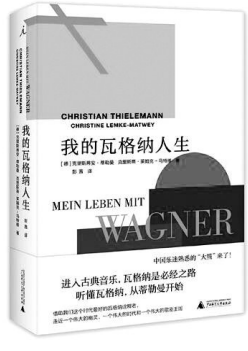
《董其昌和他的江南》

本书以“董其昌和他所处的江南社会”为切入点,邀请来自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美术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博物馆与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撰文并配以百余幅精美书法、绘画作品。内容主要涉及时代背景、地域环境和董其昌的交游、鉴赏、艺术理论与创作,以及董其昌的后世影响等,全方位呈现出董其昌的生平与艺术成就,有助于引领读者从多角度深入了解董其昌的艺术成就,并进而了解中国传统书法、绘画艺术的博大精深。



《一念永恒》

我们都读过余光中的《乡愁》,但很少有人知道,余光中晚年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赛车手。他将这种畅想都写进了这本散文集中,他爱自驾旅行,行万里路,看尽天下美景。他乡愁入骨,诉说游子的心绪,光阴的故事。他把四个女儿的男朋友视为“假想敌”,与他们真诚对话。他追求活得高级和有趣,使人敬而不畏,交接愈久,芬芳愈醇。



《我的瓦格纳人生》

作为当今最负盛名的德国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以严肃、低调、内敛、谨守德奥传统著称。在30年的歌剧指挥生涯之后,蒂勒曼首次以文字方式呈现他的瓦格纳人生——瓦格纳如何成为他命途的指引,如何造就了他的音乐思想和情感,他又如何运用这种思想与情感去阐释瓦格纳。